

國家安全體制與美國冷戰 知識份子



在先後由二戰和冷戰所塑造的特定的制度結構中，一群美國社會科學家廣泛深入地介入了政治權力和國家政策，建立了自由民主政治中罕見的知識和權力的高度共生關係；這種特定情形的制度和政治條件可以從「國家安全體制」這個概念出發加以闡發，而這些社會科學家可稱為「冷戰知識份子」。

十九世紀後期，社會知識通過學科分化和進入大學而形成專業化、制度化的科際體系。在這個「社會科學」形成的知識運動中，社會知識領域確立了科學主義的信念，相應地經歷了一個根本性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 過程，即力求擺脫價值／道德判斷、棄置對政策問題的關注、脫離政治權力領域的過程。新生的各門社會科學和政治決策之間、知識份子(特別是大學知識份子)和權力階層之間發生了深刻的疏離。根據一種廣泛的世俗化現代性觀念，知識和權力的分離是更廣泛的社會分化——即各社會領域取得相對獨立地位的過程——的結果，也是現代社會政治生活應然的常態。然而，人們也發現，現代社會思想／社會科學與民族國家政治之間廣泛而深刻的相互影響其實從未中斷，知識和權力之間具有強固的制度性共生關係，而且歷史在不斷地塑造和再造着知識和權力關係的具體形態。

知識社會學的核心問題——即知識和權力的複雜互動和張力關係問題——的研究已被許多其他學科和領域引入。在新冷戰國際史運動中，科學和意識形態在國際鬥爭中的影響也受到更多的關注。在這個基本問題意識之下，本文要考察的是發生在二十世紀中葉美國的一種情形：在冷戰的特定歷史情境下，在先後由二戰和冷戰所塑造的特定的制度結構中，一群社會科學家廣泛深入地介入了政治權力和國家政策，建立了自由民主政治中罕見的知識和權力的高度共生關係，建立了社會科學家和政治權力階層在理念、目標和行動上的高度一致性。這種特定情形的制度和政治條件可以從「國家安全體制」(National Security State) 這個概念出發加以闡發，而這些社會科學家可以被稱為「冷戰知識份子」(cold war intellectuals)。

* 因篇幅所限，本文有刪節，全文及完整註釋將刊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www.cuhk.edu.hk/ics/21c)。

一

「國家安全體制」是一個並未得到廣泛運用的術語，但這個概念其實有着重要的分析和啟發價值，能夠標示和凸顯戰後美國政府體制、特別是其對外政策的制度機制的基本特性。就其最初和最基本的含義而言，「國家安全體制」指的是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戰後初期美國政府機構的重組，特別是通過1947年《國家安全法》的實施，形成的與對外政策相關的聯邦政府官僚機構的總體。這一國家制度設施的理念基礎是內涵比「外交」和「國防」都更廣泛的「國家安全」觀念，基本目標是以總統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為核心，在政府內政治、軍事、外交、內政、經濟、情報等各職能部門之間實現政策制訂的集中統籌和全面協調。與「國家安全體制」形成過程相伴隨的是「帝王式總統制」(imperial presidency)，特別是總統在對外事務上的權力擴張，情報部門政策影響力的上升，以及常規外交職能部門(國務院)實際影響力的下降^①。

戰爭具有塑造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巨大力量，「國家安全體制」的許多要素正是起源於二戰期間的全面動員。在二戰以前，與其國家政策的孤立主義特性相適應，美國聯邦政府的職能總體上偏重於內政，外交和防務機構的規模都維持在很低的水平，而且這兩個部門之間缺乏充分的協調和合作。作為一場「現代全民戰爭」和美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總體戰」，二戰不僅決定性地改變了美國外交國防政策的基本內容和風格，最終使美國徹底擺脫孤立主義而確立了全球主義的對外政策體系，而且對政策制訂的組織形式和制度結構產生了劇烈而深遠的影響。戰爭要求在軍事上對廣泛和複雜的戰爭行動實施高度集中化的運籌和計劃，要求克服各軍事部門和官僚機構的本位主義，要求軍事、外交和政治諸領域政策和行動的密切協調。戰爭要求在國內進行經濟動員，來為軍事行動提高物質保障。戰爭還要求科學和智力資源的動員，實施各種綜合性的研究、開發活動。戰爭極大地提升了情報的收集和分析工作的地位，並促使情報活動由純粹軍事性質的戰場戰術形態，向高端的、更具綜合性質的戰略情報模式轉換。而社會學家在戰爭中膨脹起來的「情報共同體」(intelligence community)中發現了貢獻專業知識的廣闊空間。繼受大蕭條衝擊、聯邦政府在新政期間迅速擴大規模及其經濟和社會職能之後，美國的政府體制和國防體制又在因應這種全面戰爭挑戰的過程中發生新的擴張。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及時擴充了總統在外交和防務決策上的權力，增進其對政策的統籌協調能力，相應地在機構和程序上採取了一些特殊和臨時的行政安排。後文將顯示，二戰中美國政府和軍方的目標、活動和制度安排，對美國的社會科學生態和運作產生了深遠影響。

戰後迅速展開的冷戰使戰時旨在強化部門協調和整合的組織安排獲得了繼續存在下去的條件，而且以更正式和制度化的方式被固定下來。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的是1945年9月由艾伯斯塔特(Ferdinand Eberstadt)主持的研究小組提交的題為「陸軍部和海軍部的整合以及戰後的國家安全組織」的報告。艾伯斯塔特報告追溯了二戰中美國在軍事政策和組織方面的基本經驗，指出美國傳統的政府

「國家安全體制」的許多要素正是起源於二戰期間的全面動員。作為一場「現代全民戰爭」和美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總體戰」，二戰不僅決定性地改變了美國外交國防政策的基本內容和風格，而且對政策制訂的組織形式和制度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而社會學家在戰爭中膨脹起來的「情報共同體」中發現了貢獻專業知識的廣闊空間。

官僚體制無法適應當前規模和深度的對外政策活動，在軍事政策與政治活動、外交活動和經濟活動的協調統籌方面，在動員和結合科學研究方面，在情報的有效處理方面，在民眾動員、物資採購、後勤保障以及軍事教育和訓練方面都存在嚴重不足。報告的着眼點實際上在於美國政府如何建立合理的整體性對外政策體制的問題，作為結論明確提出「在國家安全方面實現整個組織結構的一體化」即建立單一的國家安全體制的綱領性主張。

艾伯斯塔特報告為戰後美國的國家安全體制設計了藍圖，而這個藍圖符合美國對其全球角色的新定位，符合日益明顯地浮現出的遏制共產主義的冷戰戰略目標，也符合執政的民主黨強化和擴大國家職能、建立「大政府」的政治理念。艾伯斯塔特報告得到政府上下的廣泛支持。1949年12月19日，杜魯門 (Harry Truman) 在就任總統後向國會提交的第一份咨文中，就接納了艾伯斯塔特報告的主要內容^②。到1946年初，大多數政策制訂者「都感到應該把對外政策、軍事資源以及國內經濟資源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而且已經在為此而採取行動。1947年國會通過旨在「確定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政策和手段的統一體制以及各部、局、政府的職能」的《國家安全法》，將戰時成立的「國務院—海軍部—陸軍部協調委員會」改組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建立國防部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並建立直屬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中央情報局。

1945年9月由艾伯斯塔特提交的「陸軍部和海軍部的整合以及戰後的國家安全組織」報告，為戰後美國國家安全體制設計了藍圖。它強調指出，鑒於美國在當代世界的特殊地位及面臨的危險，美國應該做出持久的準備，建立「一個敏銳的、運轉順暢的和高效率的機器」，以運用全部政治、軍事和經濟資源來應付未來可能遭到的進攻。

1947年的《國家安全法》全面貫徹了艾伯斯塔特報告的精神，確立了戰後國家安全體制的組織制度框架。它不僅是對戰時經驗的總結，而且也是為適應當時業已展開的冷戰而做出的制度安排。國家安全委員會是這種新組織體制的核心，其法定職能是「就涉及國家安全事務的國內政策、對外政策和軍事政策諸方面的統籌協調向總統提出建議」，促進政策程序和組織的協調，並就長期政策進行規劃。中央情報局是獨立的政府機構，並通過國家安全委員會直接對總統負責，它的建立，改變了此前政府和軍方各有其獨立分散的情報來源的局面，並提高了情報工作在決策程序中的地位，也加強了總統對情報工作的集中領導。由此延伸出來的直接後果是：造就了一個強大的情報界，並加強了其與社會科學家群體的聯繫。

國家安全體制不僅是一種強調部門間政策統籌協調和組織一體化的政府組織制度形式。其創建者還有着更深刻廣泛的目標，即：為了贏得已經展開的全球冷戰而對美國全社會中各個領域、各種形式的力量和資源實施全面深入的動員和統籌。由艾伯斯塔特的報告確立、作為美國對外政策的新核心的「國家安全」概念，綜合了外交、國防、內部安全等方面的內容，成為一個具有廣泛包容性和內在擴張性的概念。報告稱：「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承擔的責任和義務相比，『國家安全』這一用語在內容和範圍上的變化是明顯的」，而戰後美國「已經極大地擴展了自身的國際責任，反映出我們現在的國家安全觀念是以世界安全的概念為基礎的。」它還強調指出，鑒於美國在當代世界的特殊地位及其所面臨的危險，美國應該做出持久的準備，建立「一個敏銳的、運轉順暢的和高效率的機器」，以使全部政治、軍事和經濟資源都可以被用來應

付未來任何可能遭到的進攻^③。實際上在艾伯斯塔特報告中得以確立的國家安全理念不僅反映在新建立的政府組織體制中，也體現在美國冷戰的總體戰略、政策和行為的方方面面。1950年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 (NSC68) 是美國冷戰的綱領性文件，它號召建立一個舉國冷戰體制：「比以往預期的速度更快地積累政治的、經濟的和軍事的力量……是唯一與實現我們的根本目標的步驟相一致的路線。」杜魯門後來寫道，NSC68「意味着一種和平時期的巨大的軍事努力。它意味着將我們的預算增加兩到三倍，意味着高稅收，意味着實施各種經濟管制。它意味着我們和平時期行事方式的巨大改變」。^④

「行事方式的巨大改變」當然不僅僅涉及美國聯邦政府的官僚機構和軍隊。為冷戰而進行的動員涉及到美國社會的諸多領域，從而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美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性狀。杜魯門沒有提到、但為後來的許多研究不斷證實的是，美國教育體制和包括社會科學在內的科學研究體制和生態也受到冷戰的重新塑造。任何政府體制都會以制度和非制度的方式將其觸角伸向更廣泛的社會領域。無論在理念上還是在實際的運作中，國家安全體制都遠遠超出了單純的政府制度的範圍。要全面深入地理解美國冷戰的政治學和社會學，要理解冷戰的國內政治的和制度的基礎，特別是要達成本文的目的——即說明社會科學家與國家政治建立聯繫的方式和途徑以及社會學家在冷戰政治中的作用，那麼僅考察政府體制是不夠的。通過上文和下文的論述我們應該能同意這樣的做法，即在不失其應有之義的基礎上對這個概念進行合理的擴展，即由一個政府政治學概念轉換成一個政治社會學概念，用來指稱戰後美國建立的全面動員和協調國內政治、經濟、軍事資源以及意識形態和知識資源的舉國冷戰體制。

為冷戰而進行的動員涉及到美國社會的諸多領域，美國教育體制和包括社會科學在內的科學研究體制和生態也被冷戰重新塑造。任何政府體制都會以制度和非制度的方式將其觸角伸向更廣泛的社會領域。國家安全體制遠遠超出了單純的政府制度的範圍。二戰後冷戰知識份子的出現，可以說是美國國家特性的歷史展開的結果。

二

二戰後冷戰知識份子的出現，與美國歷史有深刻淵源，可以說這是美國國家特性歷史展開的結果。相對於歐洲而言，美國學術受到獨特的美國式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影響，不喜抽象哲理思辯和宏大理論，向來有很強烈的現世精神，更關注現實生活和政治問題。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美國社會科學形成獨立體系和世界地位的關鍵時期，而當時適逢進步主義運動聲勢浩大地展開，在反對保守主義且具有強烈科學主義思想和社會批判意識的社會科學家和政治家中，出現了將社會科學的技術手段引入政府政策制訂、解決社會實際問題的自覺意識，形成最初的「科技治國」(technocracy) 思潮。而這種思潮成為美國社會科學中具有鮮明美國特性的組成部分。1890年代，威斯康辛大學校長巴斯克姆 (John Bascom) 倡導大學專家通過與政府部門進行合作來實現科學服務於國家的「威斯康辛觀點」(the Wisconsin idea)，以該校經濟、政治和歷史學院為基地，率領一群社會科學家對這種主張加以身體力行和宣傳推廣。1900年，著名進步主義政治家拉福萊特 (Robert M. La Follete) 當選威斯康辛州州長，向威斯

康辛大學的學者大開參與州政之門，以至於時人誇張地稱其為「一所統治着一個州的大學」。進步主義運動中興起了廣泛的社會調查運動，其主旨是探索用專門化的科學知識和方法達成社會改良的目標。進步主義運動在「社會知識與社會行動之間」生成了「一種富有創意的結合」，為美國形態的社會科學確立了一個重要的傳統^⑥。

但是，存在於美國的社會科學和政府權力之間基本的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疏離，並未因進步主義運動而終結。在大蕭條以前，社會科學的學術活動和學術制度基本上仍在按照自身的邏輯演進，而沒有受到國家政治的明顯影響。當時對美國社會科學發展產生最重要影響的一個事實是，大學逐漸成了學術生活的中心制度，社會科學研究的其他傳統載體的地位相對衰落，形成了大學壟斷社會科學知識生產和專業人才繁殖的局面，乃有「大學之外無學術生活」或「大學之外無知識份子」之說。而大學制度發展的一個伴隨物和必然結果就是學術的繼續深入分化和制度化，不同系科內部形成獨立的專業文化和話語形態。這對知識份子參與專業和學術以外的事務是一個有力的制約。獲得學術地位的熱望、對方法論和理論的強調，以及對科學精神的追求都傾向於把社會科學家限制在大學範圍內。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植根於大學、追求「純」科學傳統的德國社會科學對美國的影響十分巨大。自進步主義運動以來，社會科學家中固然有涉入政府事務者，如參加政府委員會，向政府機構提供諮詢。但總體上這些都是零星和例外的情況。西爾斯(Edward Shils)說：「瀰漫在美國各大學的認為政治不乾淨的流行觀點中，威爾遜(Woodrow Wilson)作為政治學教授和美國總統是一個偉大的例外。」^⑦這種態度實際上也是進步主義運動中參加改革活動的知識份子的普遍觀點，對他們來說，「改善政治等於消滅政治」的城市管理運動。總的看來，專業社會科學家對掌權者持懷疑、輕蔑和懼而遠之的心態。對進步主義運動中參與社會改革的知識份子來說，介入社會政治事務的主要方式是提供知識技術和進行社會政治批判，而不是與政治家建立共同思想和行動基礎。同樣重要的是，政府和大學之間幾乎沒有任何相互聯繫的正式制度機制。

大蕭條和二戰是美國歷史上空前嚴峻的兩大危機，它們在根本上改變了國家和社會科學的關係。羅斯福總統組建和倚重作為白宮幕僚的「智囊團」(brain trust)。對此當時的觀察家評論道^⑧：

「智囊團」的影響完全蓋過內閣。人們都知道它對總統有着更大的影響。……它把教授們從各學府中招來，而教授們把內閣成員擠到一旁，使他們只充當部門領導和高級職員的角色。日常行政事務你不妨找內閣成員，但對涉及政策和高層政治的事，你得和教授們商量着辦。

羅斯福新設了一些行政機構，並建立了各種總統委員會，而充斥於這些機構中的除了工程師之外就是以經濟學家為主的社會科學家了。新政使作為「消費者」的政府對作為生產者的社會科學家提出新的需求，產生了實施社會科學家所熱

大蕭條和二戰是美國歷史上空前嚴峻的兩大危機，它們在根本上改變了國家和社會科學的關係。羅斯福總統組建和倚重作為白宮幕僚的「智囊團」。當時的觀察家指出，「智囊團」的影響完全蓋過內閣：它把教授們從各學府中招來，而教授們把內閣成員擠到一旁，使他們只充當部門領導和高級職員的角色。凡涉及政策和高層政治的事，你得和教授們商量着辦。

衷的「社會工程」的機會。而社會科學家也由此對其在政策和政治中的作用也有了新的估計，他們欣然看到「某種更廣泛的體制需要它們。」^⑧

新政所開啟的社會科學家大規模參與政府事務的趨勢，在二戰中得到進一步加強，而且這種參與的範圍顯著地擴大到軍事、情報和外交領域。政府在戰爭緊急狀態下進行的動員幾乎是無所不包的，「人們模模糊糊地感覺到，為了贏得總體戰，各種類型的頭腦，甚至學院型的頭腦，都是必需的。」^⑨自然科學家和工程師在武器研發中確立了新的重大作用和顯赫地位，形成了「大科學」的模式及政府組織和贊助科學研究的例制。一位曾在陸軍情報部充當領導人的社會科學家回憶道，社會科學家「像他們的自然科學界同事一樣，也希望在問題涉及其專業領域時能出謀獻策」^⑩。

總體戰的確也需要社會科學家，儘管其程度不如對自然科學家和工程師的需求之甚。戰略情報局 (OSS) 下屬的研究分析處 (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 在哈佛大學人類學家蘭傑 (William Langer) 主持下招集社會科學家組成團隊，就敵方的後勤和經濟系統、戰略轟炸的目標選擇和效益評估、國內軍工生產的規劃和組織等方面的問題進行研究。戰後冷戰知識份子中的許多著名人物，如歷史學家施萊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Jr.) 和經濟學家羅斯托 (Walt W. Rostow) 等都曾參與其事。美國第一個地區研究機構遠東學會即由戰略情報局於1943年建立。陸軍情報局 (OWI) 海外部則專門從事海外宣傳和心理戰的研究。這裏的心理學家、人類學家、語言學家和記者從事的研究包括軍隊士氣、敵國和盟國的民意狀況以及達成有效宣傳的手段，乃至於一種更具綜合性的「國家性格研究」 (National Character Studies)。國家性格研究中最著名的成果、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 的《菊花與刀》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就是基於其在陸軍情報局時對日本文化的研究。社會科學家大規模進入政府特別是軍隊，心理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外交史學家和國際法專家佔據了傳統上由職業軍人和外交官佔據的位置。而政府和軍隊裏的學者又把他們在大學裏的同事和學生帶進來，致使其中的許多機構實際上成了大學之外的新的社會科學研究平台。許多社會科學家從此成為在政府和學界之間「進進出出的人」 (academic/government in and outers)，通過他們政府和學界之間建立了穩定而且不斷擴展的紐帶。在鉅額財政支持之下，社會科學家也開始建立自己的「大科學」。來自政府的財政支持使得以前反對接受政府經費的私立大學領導人也開始改變態度，因為割斷戰時和聯邦政府建立起來的聯繫，恢復戰前狀態的思想已經不太現實了。

在福利國家和國家安全體制的生成過程中，美國聯邦政府開闢了新的活動空間，而這又增加了社會科學家研究工作的領域和介入政府活動的領域。新政福利國家和國家安全體制可以分別表示戰後美國國家體制對內和對外的兩個基本方面，而社會科學在國家體制中新地位和作用正是當時美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變化趨勢。社會科學形成了對政府的高度依賴，連接大學和政府的制度機制和人脈紐帶也建立起來了。政府政策及其對社會科學的動員影響了許多社會

戰略情報局下屬的研究分析處在哈佛大學人類學家蘭傑主持下招集社會科學家組成團隊。國家性格研究中最著名的成果《菊花與刀》，就是基於其在陸軍情報局時對日本文化的研究。社會科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外交史和國際法專家佔據了職業軍人和外交官的位置。許多社會科學家從此成為在政府和學界之間「進進出出的人」。

科學家的研究興趣和方向，創生了新的研究論題、研究領域和研究形態，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二戰重新塑造了社會科學的科際體系和整體生態。同樣重要的是，許多社會科學家建立了對美國的世界作用的全新認識，確立了對美國國家目標的穩固認同，相應地對自身在國家政治和政策制訂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想法發生了決定性的轉變。冷戰時期許多主要的社會科學家的政治思想、意識形態取向、行動風格和工作習慣是在這一段時期內形成的。冷戰知識份子因冷戰而得名，但其作為一個歷史現象的發生卻是在此前的美國歷史當中。

三

本文認為，社會科學研究與國家安全體制的制度性共生關係是觀察和把握冷戰知識份子的一個集中、切近和有效的途徑。作為舉國冷戰體制的國家安全體制的建立，意味着一個「國家官僚—軍事—工業—科學複合體」的形成，而戰後美國的科研體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國家安全體制的延伸制度體系。實際上，戰後建立國家安全體制的過程，也是在二戰經驗的基礎上建立政府動員和利用社會科學的複雜制度機制的過程。美國戰後科研體制突出的變化首先在於國家的大規模介入及其在管理上實施一定程度的集中化。但是與其國家政治體制的基本特性相一致的是，戰後美國科研體制又具有某種「分散多元」(fragmented and pluralized)的特徵^⑩，政府對社會科學支持、動員和利用是通過多種制度設施和複雜的機制進行的。

情報和軍事機構對社會科學的大規模支持和利用開始得最早，態度也最為積極。1946年7月，在籌組統一的情報體系的過程中，當局者即明確提出「統籌利用非官方社會科學研究」^⑪，並宣稱：「……在經濟學、科學、生物學、地理學、社會學等」許多領域中，「國家安全要求基礎研究和分析活動以集中統一的方式進行，以服務於中央情報當局屬下的各情報機構。」^⑫而1946年到1950年，海軍研究局 (the Office of Navy Research) 實際上一度成了「聯邦政府資助學院科學研究的主要聯邦政府機構」。正是通過海軍研究局的運作，聯邦政府形成了一整套贊助大學研究的管理機制，而且既資助「純粹為了增長知識」的研究工作，又扶植「具有潛在應用價值」的項目。

國家安全體制以各種方式和途徑動員私人機構 (特別是私立大學) 和資源服務於冷戰的國家目標。在政府對社會科學的直接資助中，行政性研究合同 (administrative research contract) 是主要方式，成為「獨特的動員社會資源以服務國家需要的美國體制的核心」^⑬。貌似「非集中化」的政府合同體系使得美國的政府和科學界的動員和聯繫體制更加便捷有效^⑭：

當政府需要將這個國家最傑出的科學家納入戰爭計劃時，與其將個別科學家延攬為政府僱員，不如與既存的企業和機構合作，這樣做事情會好辦得多，而且省卻了許多全職僱用關係帶來的麻煩。……合同體系使得政府研

美國戰後科研體制突出的變化，首先在於國家的大規模介入及管理上的集中化，但也具有某種「分散多元」的特徵。行政性研究合同是政府直接資助社會科學的主要方式。貌似「非集中化」的政府合同體系使得美國政府與科學界的動員和聯繫體制更加便捷有效，而用不着政府部門的官樣文章，也不用顧忌人員限額。

究工作也可能在私人部門中進行，而用不着政府部門的官樣文章，也不用顧忌人員限額，但是卻有更長期的保障。……這種制度……給了聯邦政府以更大的靈活性和創造性。

通過與政府簽訂的合同，「意識形態攻勢」、「心理戰」、「政治戰」、「低烈度戰爭」、「特徵戰爭」、「心智競爭」、「發展研究」、「民族國家建構」等課題和政府資金一起進入大學，由此引致與政府項目有關的研究中心紛紛成立。空軍和中央情報局最先扶助了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俄國研究中心，其後政府合同又在各大學催生了一大批亞洲和中東的地區研究機構。其中一個突出的例子是，1950年開始的一個大規模心理戰研究計劃——「特洛伊計劃」(Project Troy) 直接導致了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 (CENIS) 的建立。

冷戰的確是二十世紀社會科學史中隱秘的一章^⑥：

在某些情況下，國家安全機構的介入對學術領域的發展演變——也就是說，對學術制度的建立、文本、方法論和知識本體這些被認為是學術事業的基本要素的東西——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

十分明顯和重要的情況是，政府吸納和利用社會科學的制度化安排，成為戰後社會科學自身制度化的重要動力和內容。戰後美國社會科學發展的基本趨勢即跨學科研究和「大社會科學」的形態即與政府的作用密切相關。現在已經十分清楚的是，在冷戰前期，大型社會科學研究經費大部分來自美國軍事、情報和宣傳機構，而政府推動社會科學的目的，是資助那些與國家安全有關的內容廣泛的各種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政府項目的派生效應，1945年以後興起了諸如發展研究 (development studies)、地區研究 (area studies)、溝通研究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和行動研究 (operation research) 等主要的跨學科研究領域。

戰後初期也是私人公益基金對社會科學特別是國際研究的贊助迅速膨脹的時期。洛克菲勒財團一向熱衷於此，到1951年對國際研究的投入已超過六百萬美元。1946年卡內基基金會新任總裁約瑟夫斯 (Devereux C. Josephs) 宣布要確立新宗旨，即幫助美國「在國際事務中變得更明智並建立更成熟的情緒」，次年開始資助十多所大學的國際研究。1947年老亨利·福特 (Henry Ford) 去世後，亨利·福特二世 (Henry Ford II) 扭轉了福特基金會先前的「反智主義」。1950年蘭德公司主席蓋瑟 (H. Rowan Gaither) 主持下的一個委員會，向福特基金董事會提交了題為「福特基金會政策和計劃的研究報告」(即「蓋瑟報告」)，最終使該基金會確立了大規模資助社會科學研究的工作目標^⑦。致力於贊助社會科學事業的私人公益機構在整體上成了舉國冷戰體制的一個方面，也成了將社會科學研究引向冷戰目標和公共政策事務的重要渠道。

在國家安全體制之下，在共同的冷戰國家政治目標之下，在大學、私人公益基金與國家官僚機構、軍隊之間，結成一個以各部分之間穩定的制度聯繫和

冷戰的確是二十世紀社會科學史中隱秘的一章，在某些情況下，國家安全機構的介入對學術領域的發展演變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在國家安全體制之下，共同的冷戰國家政治目標，把大學、私人公益基金與國家官僚機構、軍隊，結成一個以各部分之間穩定的制度聯繫和頻繁密切的人員交流為特徵的龐大聯盟。

所謂「冷戰知識份子」，可以被簡單定義為高度認同冷戰的國家目標、自覺、積極介入冷戰意識形態塑造的「公共知識份子」。他們的生成和存在，正反映了美國社會科學界在冷戰前期的主流政治觀點。冷戰知識份子現象符合美國的國家特性，符合缺乏激進主義的社會思想土壤、而又沒有真正的保守主義傳統的美國式自由主義的歷史演變趨勢。

頻繁密切的人員交流為突出特徵的龐大聯盟。在這個聯盟中，許多社會科學家建立了自己專業研究工作之知識和政策的雙重導向，力求使自己的科研產品具有超越學術專業領域之外的「公共知識」品質。當時美國社會中對社會科學的科學屬性和政策效用尚存懷疑和輕視，對此，社會科學家堅持認為客觀的社會分析能夠提供用以改造美國和世界的重要工具，並為自己研究領域的實用價值進行論證和游說。美國社會科學的領袖人物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親自出面指出，社會科學研究是一種服務於國家政治目標的「資源」；問題已經不在於是否要進行社會科學研究，「而在於如何對其加以利用和發展。那些仍在討論科學地對社會生活進行研究是否可能的人已遠遠落後於時代。」^⑩而作為最具有代表性的冷戰知識份子的羅斯托則在政治和學術的雙重生涯中致力於「以一種高度互動的方式」將「歷史學、發展理論和政策」結合起來^⑪。社會科學家中之出現一個強有力的冷戰知識份子群體，不僅是國家權力動員社會科學參與冷戰的結果，也是已經在長期思想史運動和長期國家危機中政治化了的社會科學家自我動員的結果。對政策和政治的參與和貫注，對國家政治目標的高度認同，對權力階層的自覺輔佐，正是冷戰知識份子精神和行為的最基本特徵。

不難理解，冷戰知識份子的生成，與十九世紀末以來西方「新的國家形式」(或可曰「管理型國家」)形成、現代科層制和「科技政治」深化發展的長期趨勢有深刻關聯，也是社會科學的學術化論說與社會建制之間的交互作用深化發展的結果，反映了二十世紀在民族國家政治、意識形態和社會科學之間密切而複雜互動。同時，冷戰知識份子群體又是一種具有鮮明美國歷史特性的知識社會學現象，它深深植根於這個國家的政治史、思想史和國際關係史之中。在相當程度上，冷戰知識份子代表了二十世紀美國歷史變遷中的一些關鍵要素，是美國對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本國乃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對其面臨的長期內外危機所做出的反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在激蕩的國內和世界歷史風雲中趨向政治化的美國知識界、思想界達成相當程度的自由主義政治和意識形態共識的結果，是國家動員社會科學和社會科學家為反共和冷戰目標而進行自我動員的共同後果，是美國建立的全面動員的國家安全體制的一個歷史和制度派生物。

四

冷戰知識份子可以被簡單定義為：高度認同冷戰的國家目標、以高度自覺和積極的方式介入冷戰政治和冷戰意識形態塑造的一種特殊類型的「公共知識份子」^⑫。在二十世紀世界範圍的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三大社會政治思潮的衝突激蕩中，在具有深刻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思想根源的冷戰國際鬥爭中，美國的主流社會科學界做出了高度一致而且異常堅定的政治抉擇。冷戰知識份子的生成和存在正反映了美國社會科學界在冷戰前期的主流政治觀點。進而言之，冷戰知識份子現象符合美國的國家特性，符合缺乏激進主義

的社會思想土壤、而又沒有真正的保守主義傳統的美國式自由主義的歷史演變趨勢^①。

在美國現代自由主義的演進中，進步運動中具有強烈社會政治批判精神、與國家權力保持疏離的自由主義通過新政得以壯大，並轉換為長期執掌聯邦政府的當代民主黨自由主義。在這個過程中，總體上素有「左翼傳統」（以美國式的政治光譜看）、傾向推動社會變革的知識份子階層與權力階層逐漸趨向一致，建立了更大程度的共識，而其中又以社會科學家對民主黨自由主義的支持最為廣泛。1937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社會科學教授中持新政派觀點的比例達84%，為各類人群中最高。1955年對大學社會科學家的調查也顯示了對民主黨極高的支持率^②。施萊辛格在1955年看到：「近數十年來自由主義似乎勢如破竹。聰明的年輕人總是自由派，而博學深思的教授們通常也都是些自由派。」^③被認為是冷戰知識份子的人當中固然有傾向於共和黨的保守主義者（如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和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但其主體正是自由派社會科學家。這種趨勢也正反映了從1930到70年代美國自由派處於強勢，而保守派處於相對守勢的總體趨向。常春藤名校既是自由主義的思想基地，又是盛產冷戰知識份子的淵藪，正可典型體現冷戰知識份子賴以形成和存在的社會政治和思想史情境。在1950年代初出現的麥卡錫份子，是極端保守主義對新政自由主義的一種反動、且具有反知識份子傾向，他們調查和圖謀打擊的對象中不乏冷戰知識份子，而終究對這個群體沒有造成任何實質性的損害，也正說明了冷戰知識份子在國內政治和社會思潮中實際上有着穩固的地位。美國社會和知識界的意識形態構成，向來是西方各國中最为單一的，在冷戰高潮中並沒有出現類似於法國分別以薩特 (Jean-Paul Sartre) 和阿隆 (Raymond Aron) 為首的左右兩大知識份子陣營的那種程度的分裂對峙，儘管美國也有冷戰政治的異見者和批判者。帕森斯作為美國社會科學在戰後初期的領軍人物典型地體現了美國知識份子的政治抉擇。以往帕森斯對美國社會和美國自由主義的看法中不乏批判的成分，但作為一種面對冷戰政治的自覺反應，1950年以後的帕森斯把「恢復和詳細闡發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看作是它的新理論誕生的偉大道德責任」，在學術論述中呈現出「一種非常自鳴得意的自由主義」的風貌^④。

冷戰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穩定群體的最終形成，或許應該以這個群體的代表人物施萊辛格一部產生了重要影響的著作為標誌。1949年，施萊辛格年僅三十二歲，但已在學界頭角崢嶸，且在二戰期間的政府部門中積累了政策經驗和人脈關係，他發表了《至關重要的中心：自由之政治》(*The Vital Center: The Politics of Freedom*) 一書^⑤。他在這部激情洋溢、筆墨酣暢的著作中宣布，經過偉大的新政運動，左翼和右翼的極端主義在美國國內政治生活中已經歷史性地失敗了，但在世界範圍內則由於共產主義集團的壯大而使「自由社會」處於持久的危機之中。他斷言，建立在對人性和人類社會的可靠洞察之上的「美國激進主義」傳統已經在新政和二戰中獲得新生和復興，將承擔起在國際和國內「維護個人自由和對經濟生活的民主控制」的歷史使命，構成領導美國和全世界對抗共產主義的強大中堅力量。

從1930到70年代美國自由派處於強勢，保守派處於守勢。常春藤名校既是自由主義的思想基地，又是盛產冷戰知識份子的淵藪，正可典型體現冷戰知識份子賴以形成和存在的社會政治和思想史情境。美國社會和知識界的意識形態構成，向來是西方各國中最为單一的，並沒有出現類似於法國的左右兩大知識份子陣營的局面。

在冷戰知識份子內部，以及他們作為一個整體與政府之間，在國際政治問題上所達成的一致，明顯地高於對國內政治問題的共識。而這種支撐美國的全球主義對外政策體系及其在冷戰中的領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在美國被稱為「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其核心觀念可以表述為：美國的生存和利益與自由民主政體在美國以外的世界範圍內的存續密不可分。自二戰以來，社會科學家在總體上就是自由國際主義最堅定的論述者和倡導者，他們發動了一場針對普通國民的自由國際主義的公民教育運動，意圖是幫助美國克服對外部世界在知識上的匱乏和心態上的偏狹，敦促全體美國人認識並承擔其「世界責任」。冷戰中的自由國際主義實際上以一種極其固執的「反共主義」為核心。戰後冷戰知識份子最初的一個重要思想行動，就是離棄和批判在政治上更能代表羅斯福新政傳統、對蘇聯採取溫和態度的以華萊士(Henry A. Wallace)為首的民主黨派別。在冷戰展開的過程中，自由國際主義中的反共主義成分迅速促使其中的國際公正和反殖民主義成分淡化和邊緣化。自由國際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對外政策理念突出地表現在冷戰知識份子的一個強大堡壘即福特基金會中，上文提到的1950年對福特基金會有重大影響的「蓋瑟報告」最為重要的作用，正是確立這個基金的自由國際主義的思想宗旨，開啟了該基金會為冷戰目標而贊助社會科學，並為開展冷戰國際主義和冷戰自由主義的國民教育而進行的各種努力²⁸。

1949年，施萊辛格發表了《至關重要的中心》一書，宣稱經過偉大的新政運動，左翼和右翼的極端主義在美國國內政治生活中已經歷史性地失敗了。他斷言，在新政和二戰中獲得新生和復興的美國，將承擔起在國際和國內「維護個人自由和對經濟生活的民主控制」的歷史使命，構成領導美國和全世界對抗共產主義的強大中堅力量。

冷戰知識份子的自由國際主義的確可以被看作美國更為久遠的歷史傳統和國家特性在冷戰歷史情境下的投射和再生。與美國式自由主義相輔相成的是美國形態的社會政治哲學中的四個潛在的假設：變化和發展是自然的和不困難的；好東西一起來；激進主義和革命是壞的；權力必須被分割而不是集中。對美國社會科學和對外政策的考察顯示：這些關於人類社會的「正常」狀態以及社會進步的正當方式的美國式觀點深深浸透到美國社會科學對外部世界的觀察和論說當中，也滲透到冷戰知識份子影響下的對外政策行為當中²⁹。在美國歷史上根深柢固的「天定命運論」(manifest destiny)和美國式的「慈善帝國」(benevolent empire)觀念對冷戰知識份子顯然具有某種隱蔽而又深刻的影響。冷戰知識份子傾向於在學術和政策思考中使國際和國內的界限模糊起來，對美國作為現代社會典範的意義，對美國和他們自己改變世界的能力抱有十足信心。

興起於冷戰中的「現代化理論」和「發展研究」是典型的美國式社會科學形態，也是「美國精神」(Americanism)的科學論說形式。而正是這個主要針對第三世界的研究專業成為冷戰知識份子最為密集地存在的領地之一，也成為他們的政策影響最為明顯集中的領域。與此相關的一個重要事實是，從戰後到1960年代初美國形成了整體性的對第三世界政策，而這個政策領域正是受社會科學影響最為深重的對外政策領域。甚至可以說，是社會科學家而不是政治家在更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國對第三世界的政策。

冷戰知識份子的精神世界中同時夾雜着對自由主義前途的自信樂觀和極為深重的時代危機感。施萊辛格在1940年代末認為，他們所處的是「充滿麻煩

和焦慮的時代」，是一個「好則是轉型、壞則是大災難的時代」，「任何維護和平和自由的道路都是狹窄而危險的」，西方民主瀕臨「失敗的邊緣」。而羅斯托在1960年代依然認為「自由的事業看起來處於守勢」^⑧。在信念和危機感之下是一種知識份子特有的、精英主義色彩濃厚的使命感和行動主義，一種極富進攻性和戰鬥性的精神狀態，一種急於使自己的理論付諸實施的迫切心情。1961年，與東部學術界交誼深厚、注意延攬學界精英的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入主白宮，許多和他一樣年輕、也和他一樣「不僅渴望佔有權力的世界，而且也渴望佔有這個世界的思想領域」的學者教授成群結隊地進入政府部門和白宮幕僚機構^⑨。

除了少數人是因為論證美國冷戰目標的正當性和參與製造冷戰的公共輿論而被算入冷戰知識份子行列之外，大多數冷戰知識份子都有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的政策和政治實踐經驗。這些政府和軍隊中的學者教授賦予他們所製造的情報分析、備忘錄和政策建議以濃郁的學術內涵和理性氣質，也往往不乏深遠的立意和綿長的思緒。換句話說，他們在從事政策思考時往往不就事論事，不單純從即時性對策出發而更願意從長遠歷史和政治觀點着眼，因而也更多地具備「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思維取向。他們對因循守舊、缺乏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工商階層的「富豪統治」(plutocracy) 感到厭惡和蔑視。在某些情況下，他們介入政策制訂可能而且確乎對軍人和外交家的短期的、狹隘的觀點構成修正和制約。他們在政府中的存在無疑有助於加強政治的知識基礎，提高政策的知識含量。然而他們的思想習慣又往往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而意識形態使他們傾向於在終極原則和具體的政策問題之間建立過於簡單化的聯繫，以簡單、「純淨」的觀念模式去觀照複雜的世界，以簡單的方案去應付複雜的問題，使信念和事實、現狀和預期、美國和外國之間的界限模糊起來。

與許多人在二戰中的軍事經歷有關，又或許與國家安全體制本身在制度和文化上強烈的軍事化特性有關，不少冷戰知識份子具有一種特別的好戰尚武之風，信奉軍事手段的政治效力。羅斯托特別強調軍人在第三世界的積極意義，認為「我們必須擺脫美國自由主義觀點對軍人政權的厭惡」。1950年代末以來，冷戰知識份子首先倡導在第三世界進行反叛亂和反游擊戰的實驗，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對軍事手段的熱衷程度，有時比軍官有過之而無不及。羅斯托以其對軍隊的尊崇而被比他更溫和一些的同事施萊辛格戲稱為「手持機關槍的切斯特·鮑爾斯 (Chester Bowles)」，而後來又由於其對戰略轟炸非同尋常的熱情而被譏為「空軍上將羅斯托」。1967年，連不少軍人都已經感到在越南的空中轟炸不可能奏效，但羅斯托則仍然是當時約翰遜 (Lyndon B. Johnson) 政府中對此信心十足的極少數文職官員之一^⑩。到1968年，對越南戰爭的悲觀情緒已在美國社會中瀰漫開來，但年輕的現代化理論家亨廷頓還是堅持表達了極為樂觀的態度。他認為「美國很可能已經在越南不期而遇地發現了對付『民族解放戰爭』的辦法」，通過將「戰略村」之類的「強行規劃的城市化和現代化」與戰爭手段結合起來，美國終將挫敗「毛澤東主義激勵的農村革命」^⑪。

美國陷入越南戰爭的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冷戰知識份子所推動的；而美國冷戰政治的這一最大失敗也在很多方面標示了冷戰知識份子在知識和政治方面的雙重失敗。1960年代末以後，冷戰知識份子受到新起的美國左翼的猛烈批判。在公共知識份子的整體「衰落」之前，冷戰知識份子已先行衰落了。

美國陷入越南戰爭的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為冷戰知識份子所推動的，而美國冷戰政治的這一最大失敗也在很多方面標示了冷戰知識份子在知識和政治方面的雙重失敗。1960年代末以後，越戰引起美國國內政治和學術界的重大分化，冷戰知識份子受到新起的美國左翼的猛烈批判。在波斯納 (Richard A. Posner) 所說的公共知識份子的整體「衰落」之前，冷戰知識份子已先行衰落了。

對冷戰知識份子的考察留給我們的依然是那個歷史上被一再提出的問題：在真理和權力之間、在高度專業化的學術和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現代民族國家政治之間、在知識本身的價值和知識經常要延伸出的社會政治關懷之間，知識人將何以自處？

註釋

① 從政府官僚體制的角度界定「國家安全體制」的著作是：Daniel Yergin, *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7); Anthan Theoharis, ed., *The Truman Presidency: The Origins of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Stanfordville, N.Y.: Earl M. Coleman Enterprises, Inc., 1979)。耶金 (Daniel Yergin) 的著作對「國家安全體制」概念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

② Special Message to Congress, President Truman, December 19, 1945, in *The Truman Presidency*, 11-15

③ 同註①Yergin, *Shattered Peace*, 199.

④ Stephen Ambrose, *Rise to Globalis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938*, 7th Revised Edi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3), 112.

⑤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3), 198-204; 如恩斯 (Olivier Zunz) 著，閻循華等譯：《為甚麼20世紀是美國世紀》(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頁39-71；楊辰起：〈二十世紀美國科技治國思想述論〉(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1995)，頁2。

⑥ Edward A. Shils,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 in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 Case For A Sociology of Social Science*, ed. Elisabeth T. Crawford and Albert D. Biderman (New York: John Willey & Sons, Inc., 1969), 37-38.

⑦ *Literary Digest*, vol. CXV (June 3, 1933), 8, 轉引自註⑥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頁216.

⑧ 同註⑥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217.

⑨⑩ 同註⑥Social Scientist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editors' introduction", 8; 11.

⑩ Leonard W. Doob, "The Utilization of Social Scientists in the Overseas Branch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1, no. 4 (August 1947): 469.

⑪⑫ Aaron L. Friedberg, "Science, the Cold War, and the American State", *Diplomatic History* 20, no.1 (Winter 1996): 108-109; 111.

⑫ 154.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Souers) to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Authority,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 (FRUS), 1945-1950, Emergence of the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 www.state.gov/www/about_state/history/intel/145_154.html.

- ⑬ 156.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Vandenberg) to the Intelligence Advisory Board, *FRUS, 1945-1950, Emergence of the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 www.state.gov/www/about_state/history/intel/155_164.html.
- ⑭ Christopher Simpson, "Universities, Empire, and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n Introduc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ed. Christopher Simpson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xii.
- ⑮ Robert A. McCaughey,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nterprise: A Chapter in the Enclosure of American Lear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132-46.
- ⑯ 轉見Michael E. Latham,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48-49.
- ⑰ Walt W. Rostow, *Essays on A Half-Century: Ideas, Politics, and Ac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8), 2.
- ⑱ 全面考察美國公共知識份子的波斯納 (Richard A. Posner) 即把冷戰知識份子看成是一種公共知識份子。參見波斯納著，徐昕譯：《公共知識份子——衰落之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頁202、242-62。
- ⑲ 關於相關問題最著名的討論，參見桑巴特 (Werner Sombart) 著，賴海榕譯：《為甚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the Revolution*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1)。
- ⑳ 參見李普塞特 (Seymour Martin Lipset) 著，張紹宗譯：《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297-302。
- ㉑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6), 38.
- ㉒ 亞歷山大 (Jeffrey C. Alexander) 著，賈春增等譯：《社會學二十講：二戰以來的理論發展》(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頁18、54。
- ㉓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Vital Center: The Politics of Freedo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9)。
- ㉔ Gregory K. Raynor, "Engineering Social Reform: The Rise of the Ford Foundation and Cold War Liberalism, 1908-1959" (Ph.D. diss., New York University, 2000), 143-49.
- ㉕ Robert A. Packenham, *Liberal America and the Third Worl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deas in Foreign Aid and Social Sci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8-20.
- ㉖ 羅斯托 (Walt W. Rostow)：《從第七層樓上展望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頁12。
- ㉗ 施萊辛格 (Arthur M. Schlesinger) 著，仲宜譯：《一千天：約翰·菲·肯尼迪在白宮》(北京：三聯書店，1981)，頁134-37。
- ㉘ 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155, 161-63. 鮑爾斯是以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和自由國際主義主張而聞名的民主黨政治家。
- ㉙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Bases of Accommodation", *Foreign Affairs* 46, no. 4 (July 1968): 642-56.